① 临济宗是中国佛教禅宗的五家之一，由于开创者义玄（？—867）在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县）建临济禅院，举扬一家宗风，故后人称之为临济宗。

②、③、④、⑤、⑦、⑧、⑨、《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

⑥ 木陈忞：《北遊集》

⑩ 木陈忞：《百城集》，转引自陈垣《清初僧诤》

⑪⑫寒松智操：《寒松语录》

⑬ 曹洞宗也是中国佛教禅宗的五家之一，由于开创者良价和他的弟子本寂，先后在江西高安县的洞山和吉水县的曹山，举行一家宗风，故后人称之为曹洞宗。宋以后，曹洞一宗法脉远不及临济之盛，故有"临天下，曹一角"之称。

⑭ 幻有传（1549—1614），名正传，号幻有，江苏溧阳人，俗姓李。因他住持宜兴龙池寺，故称龙池幻有传，他属临济二十九世，是明季著名禅僧，密云园悟、天隐园修、雪峤园信皆出其门下。玉林琇是他的法孙。乐安，又称乐菴，是幻有传的剃度师。

⑮⑯聂先：《续指月录》

读史扎记

朝鲜与郑成功父子

孔　立

有关郑成功父子与荷兰、英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关系，都有专文作过论述，而郑氏与朝鲜的关系则未见有专门的介绍。近读朝鲜《李朝实录》、日本《华夷变态》等书，看到一些颇有价值的史料，感到朝郑之间的关系也有值得研究之处，因此写成这一篇扎记。

从现有资料看来，朝鲜与台湾郑氏之间没有直接的官方的联系；郑氏对朝鲜的态度如何，尚未见有记载；朝鲜方面曾经注意郑成功父子的动态，担心郑氏举兵进取朝鲜；在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对郑氏的态度存在着分歧。此外，上述资料还涉及清朝当局担心郑氏与朝鲜"连兵"的问题。这都是研究台湾郑氏历史所不可忽视的问题。

早在朝鲜李朝仁祖二十五年（清顺治四年），朝鲜方面就已经得到有关郑氏集团的消息。那时有福建商贾五十一名前往日本贸易，船只漂流到朝鲜。船主讲了郑芝龙等人奉立唐王，以及当时中国的一般情况，并说他们是由郑芝龙派往日本，用"官银"进行贸易"以助军饷"的①。当时中国船只经常往来于朝鲜的济州一带，遇风泊岸，停留数日，是常有的事，其中就有郑氏的船只，所以说"济州乃郑锦（经）船往来日本之路也"②。显宗八年（康熙六年）郑氏官商林寅观等九十一人，十一年沈三等六十五人遇风漂到济州③，肃宗七年（康熙二十年）又有高子英等二十六人，九年有"船头"从东宁（台湾）来到东莱府④。这些人是朝鲜方面获得有关台湾郑氏消息的来源之一。

消息的第二个来源是来自朝鲜派往清朝的使臣。朝鲜当局经常派使者前来中国，并通过他们打听中国的动态，其中包括有关郑氏的消息。例如，显宗即位年（顺治十六年）朝鲜使者回国时报告说，传闻郑成功北征，"北京汹汹"，又说"通报有曰：国姓（郑成功）死于乱军中"⑤；后来，历年的使臣都报告有关中国的见闻，包括郑氏的消息⑥。

第三个来源是来自日本方面。例如，肃宗二年（康熙十五年）朝鲜译官韩时说通过"探问岛倭"，向上司报告有关吴三桂、郑经与清方作战，郑经向日本请兵的消息。六年日本商人报告了郑经从厦门退往台湾的消息⑦。

此外，朝鲜使者在北京时还向琉球使臣打听有关郑氏的消息。肃宗八年朝鲜使臣"欲知

郑锦事情”，派译官金喜门向琉球使者“多般探问”。同年，朝鲜的使臣申琓也派译官向琉球通官打听郑经的消息⑧。

由此可见，朝鲜当局获得有关台湾郑氏的消息主要是依靠传闻，其中有可靠的，也有不可靠的，甚至是错误的。不过，有些消息及其所引起朝鲜方面的反应，则是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朝鲜当局担心郑经进攻朝鲜

三藩之乱发生时，朝鲜当局便担心“福建兵祸，不无延及本国之虑”，提出“方今天下之大乱，郑锦之睥睨，海岛之乘机，不可无深忧而预备之策”⑨。因此，他们对郑经始终有所防备。

肃宗四年（康熙十七年）朝鲜大臣领议政许积提出，吴三桂、郑经如果与蒙古联合抗清，朝鲜就要受到威胁，要求研究“备虞之策”⑩。右参赞尹镌则估计，郑经与吴三桂合谋，可能用水师在海上活动，直逼山东，同时与日本联络，这就会威胁到朝鲜，因而主张“扶义自奋”，以巩固朝鲜的地位⑪。不仅如此，台湾郑氏的存在，也曾经引起朝鲜平民的不安。日本延宝三年（康熙十四年），从朝鲜传到日本的消息说，吴三桂对郑经说，如果这次战争得胜，郑氏可以统治朝鲜。郑氏是朝鲜六姓之一，五、六百年前就有释家预言，五百年后将由郑氏统治朝鲜。所以朝鲜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担忧⑫。

但是，实际上郑氏的力量并没有构成对朝鲜的真正威胁。几年以后，虽然还有人担心“安保其（指郑经）不为我国（指朝鲜）患乎”，但有人已经看出，郑经的势力已经“穷蹙不能自振”，“似难越海侵人国矣”⑬。肃宗九年（康熙二十二年）日本对马州太守平义真写信指出，传闻郑经出兵侵入朝鲜，指责朝鲜方面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日本。朝鲜当局回信说：“传言闽兵深入台湾，扼其要害，郑锦势穷力屈，率民男妇数十万出就招抚。信斯言也，与来书一何相反耶？”朝鲜官员也认为“郑锦方将御清人之不暇，何能至我国乎？”显然，日本的传闻是不确实的。可是这个消息却引起朝鲜上下的震惊“中外绎骚，讹言日盛，以为海寇朝夕必至”⑭。

以上情况表明，郑经从未进攻朝鲜，也不可能有进攻朝鲜的意向，可是郑氏势力的存在，曾经对朝鲜发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朝鲜当局对郑经的态度

郑氏势力对朝鲜的影响，还表现在朝鲜朝廷对郑经的态度的争论上。

起初，领议政许积认为三藩反清是为了“再造大明”，所以朝鲜不应当帮助清朝去讨伐三藩，而且“清国之势，似难久保。大明兴复之后，若有问罪之举，则无辞自解”⑮。后来，他们得知清兵失利，因而估计三藩之兵“若近北京，想（清国）有土崩之势矣”⑯。这说明当时朝鲜当局对清朝政府的统治地位是否巩固还有怀疑，所以在对清朝以及三藩的关系上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对台湾郑氏也是如此。

可是，在讨论要不要联络郑经的问题时，朝鲜大员发生了意见分歧。右副承旨尹镌认为“今日之忧，唯在于郑锦之猝迫海边，清虏之充斥西路”，郑经和吴三桂联合，势力甚强，他们对朝鲜的“服事清国”必然不满，因此应当派人渡海，与郑氏联络通好。一则可以避免吴、郑向朝鲜“声罪致讨”，二则一旦明朝势力战胜了清朝，朝鲜也有个交代。尹镌强调指出，“天下大乱皆叛胡（指清朝），而独我国服事，他日中原恢复，我国何面目可立？今送一介使通向于郑锦，则庶有辞于他日”⑰。有人还主张派人联络郑经，并约定“兴兵协力之期”⑱。相

反的，以许积为首的大员们则反对与郑经联络。他们的理由是：第一，郑经的祖父郑芝龙背叛大明，窃据海岛，“在我为贼，何以相通”⑲（显然他们也是站在明朝的立场上讲 话的）；第二，如果派出的使臣落入清朝手中，“则必生大祸”，即使不被清朝捉去，而“郑锦若以我人夸示胡人”，或是“谓我与渠连兵”，就会引起清朝举兵进攻朝鲜，酿成大患⑳。所以他们坚决反对与郑氏通好。

可见，郑氏势力的存在，曾经引起朝鲜当局左右为难。

三、清朝方面曾经担心郑经与朝鲜“连兵”抗清

这虽不属于朝郑之间的关系，但却是由朝郑关系引伸出来的。

康熙十三年，“北京讹言，朝鲜与郑锦合势，互相惊动”，“北京夏间有朝鲜兴兵入来之说”㉑，而辽宁一带也“虚传朝鲜人来袭，日夜恐惧”㉒第二年，从中国返回朝鲜的使者也告说，辽宁居民听说朝鲜“导郑锦入寇”，以及有人逃难。清政府也怀疑朝鲜与郑经勾结，而在关外添兵防守；在关内，由于在海边发现漂来的木片，人们“疑郑锦在近地造船”，而加强对沿海的警戒㉓。不久，又传说郑经的军队穿戴朝鲜的服装和笠帽，又说“郑锦舟师自海向登莱海边”，以致“京外大扰”㉔。

当然，这只是讹言而已。当时郑经已经参与三藩之乱，出兵攻打闽南一带，他与耿精忠之间也曾一度互相交战，因而郑经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联络朝鲜共同抗清。不久以后，这类传闻也就消失了。

总之，我们从朝鲜方面的史料可以看出，郑氏的活动曾经对朝鲜发生一定的影响，它使朝鲜当局在对待清朝以及对待台湾郑氏的态度上不得不有所考虑，甚至引起朝鲜内部的意见分歧，他们既担心郑经进攻朝鲜，又担心与郑氏通好将受到清朝的打击，以致左右为难。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朝鲜原来和明朝保持密切的关系，曾经援明抗清。后来清军侵入朝鲜，迫使朝鲜国王上书清朝皇帝，表明“世事明朝，各分素定，其不欲遽变臣节，亦出于情礼之当然”，表示从此以后要向清朝“称臣奉表，愿为藩邦”㉕。显然，朝鲜与清朝之间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朝鲜当局也担心郑经不满他们“服事清朝”而“声罪致讨”。第二，朝鲜当局对中国国内斗争的前景难以作出估计，因此对双方都想保持一定的关系，对与双方的接触都有一定的顾虑。

其实，朝鲜方面对郑经是缺乏认识的，首先表现在他们过高地估计了郑氏的力量，其次，还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到补充说明：一、康熙九年，即郑成功收复台湾七、八年以后，朝鲜对台湾的一般情况还不了解，朝鲜国王问道：”郑经果在何地？而众几何？”后来才听说“大樊国乃郑锦舍所主也”，“有众数十万，其地在福建海外，方千余里”㉖，这时还把台湾记为“大樊”。二、康熙二十年《李朝实录》写道：“郑锦即国信之子”，南京败后，“国信……以残兵十万走入台环”㉗把国姓记为“国信”，把台湾记为“台环”，把这样最一般的（而且是不准确的）情况载入实录。三、康熙二十三年初，即在台湾郑氏归附清朝的几个月后，朝鲜大员还说“郑锦方将御清人之不暇，何能至我国乎？”总之，这些材料说明，当时朝鲜当局虽然知道台湾郑氏举兵抗清，但他们相互之间没有官方的接触，彼此都不够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郑经的活动对朝鲜曾经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

如果这种看法大致无误，那么由此可以引伸出如下一个看法，即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当时来说，对朝鲜的影响也不大。

人们往往用现代生活的常识去解释历史，而忽略了时代的差异。在三百多年前，信息的

传递，情报的获取，是相当困难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朝鲜并没有立即得到这个消息，而是在若干年后才得到不确切的传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对朝鲜有多大影响，还有待于提出可靠的史料根据。

注①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引自本书第九、十册的引文，只注总页数），3766页。② 3857，4026页。③3944，3969页。④4075，4091页。⑤3871页。⑥3965，3993，3997，4009，4069，4089页。⑦4026，4062 页。⑧4082，4084页。⑨4030页。⑩4045页。⑪4047页。⑫林春胜等编：《华夷变态》，日文本上册，135页，东洋文库，1981年版⑬ 4084页。⑭4092—4094页。⑮3997页。⑯4000页。⑰4003，4012页。⑱4015页。⑲4003页。⑳4013页。㉑3993，4000页㉒3999页。㉓4004页。㉔4013，4018页。㉕3590页。㉖3965，3968页。㉗4076页。

试解“星斗南”

王　善　中

据樗园退叟（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寇纪略》中记载，林则徐临死以前，曾三呼“星斗南”。短短三个字，似乎是他的临终之憾。

后来，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郭柏苍：《林文忠公遗事》、《福建通志·林则徐传》等书中也都记载此事，但均未释其意。

一八八四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至广州，偶然间，“始悟其语”，认为“新豆阑，广东要地，公（指林则徐）临殁连呼之，人讹为星斗南”。①仅用张之洞此说来解释“星斗南”三个字，不足以使人完全信服。但该说却言之有理，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人，新豆阑发音成星斗南，按其家乡方言，两者同音。

新豆阑，也确实在广东实有其地。至今福州、普宁（即林死之地）一带民间还这样传闻，认为该地即指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新豆栏街。②六十年代初，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在陈锡祺教授指导下，到十三行街进行实地考察，得知，当年在十三行街附近，确有豆栏中、豆栏东等地名。③而林则徐为什么偏偏三呼其名呢？

一八四七年，林则徐早已离开广州，时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要带兵强行入城，广州人民在社学的领导下，发布抗英公召，筹募经费，组编壮勇，准备和英人决一死战，在这种气氛下，英人终不得入城，投降派耆英在侵略者和人民的两头压力下，只得借故调离他职而去。英人没有办法，也只能“以重价承租新豆栏南口内外数丈之地”，④求得居住上的方便。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耆英等奏缕陈近日办理洋务体察情形析》中记道：

“又十三行暎咪两夷馆中间有一小港，土名新豆栏，地极湫隘，而往来行人甚多，良莠不齐，民夷杂遝，因而易生事端。该夷屡欲在巷口租地建房，藉杜纷扰，而民人坚执不从。现经委员传集业户，反复开导，始议定将该处南口内外铺户六间租给夷人……该夷已筑起围墙，将两夷馆联络为一”。

侵略者用“重价”、官方以“反复开导”可以说是以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铺户六间租给夷人”这一微乎其微的收获。林则徐闻讯，对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倍加赞赏，在《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中说，广州“不至卧榻前任人鼾睡，其功在于彼间民人义愤同心”⑤。

推而论文，林则徐临死前三呼“星斗南”，决非偶然，这其中含有对外来侵略者的警惕，也